

《華語文教學研究》1.2: 121~144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2004

方言調查詞表的必要性與設計方法*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台灣語文學系
洪惟仁

1. 調查問卷的必要性

中國的漢語方言學家在進行方言調查的時候流行採用調查字表，而且這些字表是參照切韻音系所設計的，如高本漢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漢語方言調查都是。設計這樣的字表是假設現代方言都是直接由中古漢語傳衍下來的，並且口語中每一個詞素都可以對應到中古漢語，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這種漢字的音讀調查常常忽略了語言的實際，就語言學研究的目的而言，並不是好的調查方法。董同龢是漢語方言學家第一個放棄調查字表做方言調查的人，他的方法最初在〈華陽涼水井客家記音〉(董同龢 1948)中採用。他在這篇文章的前言中說：

「這次記音以及處理材料的方法……值得特別提一下。在本所方言調查的初步計畫——以最少的時間獲得全國方言大概情形——之下，一向我們調查方言，總是以紀錄某些預先選定的字為主。從他的出發點看，那自然是一個最經濟而有效的方法。不過如從整個的語言的瞭解說，我們知道，那種辦法也確有顯然的短處。第一，選字是以現代各方言所自出的『中古音系』為據，求得的音韻系統，難免是演繹式的而非歸納式的。第二，極少自成片斷的真的語言紀錄，詞彙與語法的觀察無法下手。職是之故，若干年來，我們一方面固然在繼續執行那初步計畫，一方面總也想找個機會，把漢字丟掉，蹋蹋實實的依照語言研究的基本步驟，去紀錄一種漢語。那樣的工作當是以往工作的邏輯的繼續，同時亦是他的缺點的補正。」(載丁邦新編 1981:154)

這是對於傳統漢語方言調查方法的一個初步反省，值得大書特書。聽說這種

* 本文為龔煌城主持之「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1988-1986)成果之一，研究期間接受國科會資助，謹此致謝。本文在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2003/12/27，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發表時承蒙曹逢甫教授指教，謹申謝忱。

沒有字表的方言調查方法是抗日戰爭期間由李方桂先生從美國引進¹。李方桂是薩丕爾(Sapir)和布隆菲德(Bloomfield)的學生，這種調查法是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典型的語言調查法，他們調查印地安語言自然是沒有什麼字表可用的，當然也沒有什麼韻書可參考。董同龢把這種方法引進到四川和福建、台灣的閩南語方言調查。

調查一個未知的語言最好的方法就是住進這個語言社區，學會這種語言，長久地和居民生活在一起，在頻繁的對話中培養母語人(native speaker)一樣的語感，憑著語言學家敏銳的觀察力對一個方言做詳細的觀察描寫。²

傳統單點調查只對單一個方言點做調查，為了完整地描寫一個方言，花上三、五年不算多。閩南語辭典的作者如 Douglas (杜嘉德)在廈門住了將近二十年才編成他的《廈英大辭典》(1873)，編《漢英大辭典補編》(1923) 的 Barclay(巴克禮)一輩子住在台灣³。他們都不用什麼字表，卻能夠相當完整地收集、並精確地解釋閩南語的詞彙。基督教傳教士在世界各地製作了許多優秀的辭典，紀錄了許多寶貴的語料，也都沒有用什麼調查字表。

不用字表的方法是誘發受訪者自發性談話最好的方法，這種方法不止運用在傳統的方言調查，也運用在社會方言學。社會方言學家在研究語體變異(stylistic variation)的時候，採用不同的方法做調查，如調查「唸字語體」(word-list style)和「唸書語體」(reading-passage style)時採用調查表；在調查「正式語體」(formal style)和「輕鬆語體」(casual style)的時候就不用調查表了。

傳統描寫語言學的調查，問卷提問和自發性說話兩種方法是交互運用的。語

¹ 以上有關董同龢引進不用字表的方言調查方法的過程參見梅祖麟(2000:478-488)。梅先生也在第七屆閩方言研討會(2002,廈門大學)的討論中發言主張這種方法是抗戰時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李方桂先生由美國回國(1943 年)，把美國結構語言學派描寫語言學的調查方法引進中國，董同龢首先用這種方法做了涼水井客語的方言調查(董同龢 1948)。

² 人類學家傳統地認為語言是透視原始民族的文化的工具，研究者必須熟練該民族的語言才能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但對語言學家而言，語言是研究的客體，語言學家分析所研究的語言不一定要熟練該語言，尤其做語音描寫或廣泛的地理語言學的或社會語言學的語言調查或方言調查，這種能力不一定必要，也不太可能。語言學家通常是用英語或當地的共通語進行調查。但語言學家常常具有在短時間內學會一個語言或方言的能力，習得當地語言可以增加當地母語人(native speaker)的溝通效果，以及培養當地語言或方言的語感或洞察力，對於傳統描寫語言學的語言調查有增進工作順利與語言分析能力的效果。Newman and Ratliff 說當初他們調查非洲查德的一個語言 Tera，專心研究當地的共同語 Hausa 已經很費力，覺得沒有必要學會 Tera 語，但是後來覺得如果一開始就認真學會 Tera 語，對於語言調查的效果和培養語言的洞察力是很重要的。他承認這是後見之明(hindsight)，因此積極鼓勵作語言調查的後進學者學會所研究的語言(參見 Newman and Ratliff. (ed.) 2001:4-5 引言)。

³ 杜嘉德(Carstaire Douglas)1855 年 6 月來廈門傳教，1973 年出版《廈英大辭典》，共歷 18 年，將近 20 年；巴克禮(Thomas Bakclay)1874 年來台灣傳教，1922 年以十年的時間編成《廈英大辭典補編》，1935 年在台灣辭世，總共在台傳教 60 年。其他許多基督教傳教士幾乎都是一輩子住在當地而編成辭典的。參見拙著《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洪惟仁 1996)。

法、語用的研究所需要的文本蒐集(text collection)可以不要問卷，先把音錄下來，再慢慢聽寫，有問題隨時請教發音合作人，這是誘發自發性說話的方法；但詞彙的蒐集、音系與音值的確定往往採用問卷提問。(詳參 Chelliah 2001)

但是，如果人力、時間不足，或要進一步做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沒有字表的調查的方法便會發生三個問題：

1.1 調查人力、時間的問題

把空間拉開了，調查點、受訪人多了，譬如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研究，研究者不能漫無目標，任憑發音人要說什麼就讓他說什麼，必須把握有限的人力與時間，針對一些具有方言差的關鍵詞或句型，設計調查詞表，進行調查，做到每一個調查點都很一致，沒有重大遺漏、參差才行。

沒有詞表的方言調查被動地等待所需要的語料自然出現，是一種守株待兔的方法，如果每一個方言點調查都採用這種方法，所需的時間、人力的龐大是可以想像的，這樣的調查一進行下去，必將沒完沒了，地理方言學所要繪製的方言地圖永遠畫不出來，社會方言學的調查也會因為人力時間的浪費而無法完成任務。即使稍具規模的語言都沒有辦法完成調查任務，何況是地大人多的漢語呢？

1.2 語料完整性的問題

雖然理論上，如衍生語言學家所常指出的，基於語言的無限性，語言學家永遠不能完整地紀錄下一個語言所有出現的句子。但是如果調查時間充裕，收集的資料量夠多，常用的詞彙都會出現，而音韻清單(phonological inventory)及音韻規則(rule)也很容易掌握。但是如果調查時間短促，資料量就不可能充足，就會發生資料完整性問題，有時連音韻清單都搜集不完整，補救的方法，最簡單有效的是採用特別設計的調查詞表。

董同龢的方言調查從四川涼水井客語方言調查開始到在台灣所做的閩南語方言調查都不採用方言調查詞表，這雖然是理想的傳統方言學調查方法。但他在《廈門話的音韻》(p.275)一文中說他在 1952 至 1954 年的兩年間針對新進由閩南語區各地而來的青年調查了十多種閩南語方言(後來整理發表了《四個閩南方言》(董同龢 1959))，平均每一個方言點的調查時間只有 2 個多月，顯然每一個方言所付出的調查時間都很短。在這樣倉促的時間內，每一個方言所調查的語料都只有幾條故事和歌謠，可以預料的，根據這些語料整理出來的閩南語方言音系便可能遺漏了不少音韻成分。⁴

⁴ 因為音系不完整，用這些資料去做閩南語比較就成了問題。比如楊秀芳的博士論文《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1982)歸納的閩南語方言音系就是採用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的語料。洪惟仁將之與《彙音妙悟》、《拍掌知音》以及《廈英大辭典》等文獻比較的結果發現少了許多韻母。就文讀音部分而言，楊秀芳整理的韻母只有 27 個字母，比《彙音妙悟》的 38 個字母，少了 11 個字母；比《拍掌知音》的 36 個字母，少了 9 個字母。其中原因部分是因為現代泉州音發生了韻母合併的現象，部分是因為語料的缺乏所致 (詳見洪惟仁《『彙音

董同龢在比較 Douglas《廈英大辭典》等傳統文獻之後，發現他所歸納的音位比前人少得多，但是他並未覺得是缺點，他在〈廈門方言的音韻〉（丁邦新 1974:288）辯解說：「短少的音位絕大多數是音位觀念不同、處理方法有異所致，另外是一些擬聲詞之類的「邊際語音」。」事實大概不是如此，我們認為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出在調查時間不夠，收集的資料不足。⁵

1.3 語料一致性的問題

方言類型學為了做方言的比較，或地理方言學的研究想儘量把各個方言的形式或特徵均勻地分佈在地圖上，研究者總希望每一個調查點都有調查資料，而沒有遺漏或缺漏；或者做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我們也必須在每一個社會階層：不同的年齡層、性別、職業等類格(cell)都有定量的發音人和定量的語料。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沒有一個調查條項確定的調查詞表便無法做定性定量分析。

在中國，傳統方言學通常只做「唸字語體」的調查，因此都是有調查詞表的，如高本漢為了漢字音的比較，他的方言調查採用的是根據中古音系設計的調查詞表，後來所有以繪製方言地圖為目的的中國漢語方言調查，如中央研究院前後作了八次的漢語方言調查，以及鍾露昇在台灣的地理方言調查，都是有調查詞表的，結果都製作了許多方言地圖。

董同龢也在〈廈門方言的音韻〉一文中說明閩南語方言不用調查字表的原因說：

「一方面是覺得閩語和漢字脫節遠甚於我們以往研究過的方言，如果襲用從前的方法，所得將去事實太遠；另一方面則是這一回我們有充分的時間慢慢做，不必像從前似的，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個預定的計劃。至於調查的目的，則和以往一樣，就是要做比較研究和製成方言地圖。」（丁邦新編 1981: 275）

如前述的分析，董同龢早先發覺傳統方言調查方法受到字表限制的問題可以說是具有先見之明。但是這裏他又說他的目的是「要做比較研究和製成方言地圖」。可是方言比較需要儘量一致的語料，製作方言地圖更要求語料的一致性，如果語料內容參差太大，方言比較不好進行，製作的方言地圖上也會出現許多缺漏。總之不用詞表的調查方法無法達成他所列的兩個研究目的。⁶

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96: 126-127 的分析）。

⁵ 比如在董同龢的廈門音系統裡沒有 au? 韻，董文中列出 Douglas 辭典中，如暴齒 pau? kʰi、夾薄餅 kau? po? piā 等十個 au? 韵的實詞，他質疑 Douglas 辭典「出版於 1899(按：應該是 1873)，有些材料是根據舊韻書，以上的不同是不是顯示語音有變或歸類有誤呢？」（同書 p.295）筆者比較了許多材料，做了許多調查，發現即使到今天，這些詞和音讀還普遍保存在台灣話中（包括董同龢調查的、丁邦新整理的《澎湖語彙》(1980:170)也收集到這個音節，不可能在 1960 年代突然消失，後來又恢復起來。

⁶ 不用字表的方法在台灣調查幾個漢語方言，如董同龢：晉江(泉州)、廈門、龍溪、揭揚、台北；

調查詞表的問題不完全在詞表本身，一個好的調查詞表可以網羅一些重要、但是不太常用的音類或詞彙，並且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地域非常廣闊的方言網狀調查。對以比較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為目的的研究者而言，調查詞表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

沒有調查表的方言調查最適合用在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可是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如果人力、時間不夠的話，最保險的做法還是要像高本漢及早期中央研究院的方言調查，採用一個預製的詞表，先把可以預料的音韻或詞彙資料收集完整，然後進一步放棄詞表，收集更多無法預料的資料。

上引董同龢(1948)的說明已經透露，從 1928 年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漢語方言調查採用了方言調查詞表，目的是要「在短時間內」能夠對廣大的中國方言做一個「簡單的普查」，這表示趙元任先生等語言學家並非不知道詞表的限制，只因調查時間不足、如果不使用詞表，就會發生語料完整性和一致性的問題，他們所要繪製的地圖永遠也畫不出來。採用切韻音系調查漢語方言只是傳統方言調查的一種應急策略。

總而言之，用不用調查問卷不是方法好不好的問題，要看研究目的與研究者人力、時間的條件而定，而且兩種方法可以交互運用，不能一概而論。

2. 方言比較與問卷設計

接著討論調查問卷(questionnaire)如何製作的問題。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因為針對個別方言點的調查時間有限，必須事先對這個語言的方言變異有相當的了解才能製作一個雖然簡要，但卻能得到關鍵性資料的調查問卷。所以文獻檢索、領航調查就成了非常重要的準備工作。

方言學家在進行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調查以前，必須有一些工作假設(working hypotheses)。假設必須建立在方言事實的認知上，，才能知道那些是值得調查的變項(variable)，那些變項有些什麼變體(variant)，然後才能針對問題設計問卷、進行調查。因此地理方言學的研究需要對這個語言先進行一些傳統方言學的調查；社會方言學必須要有傳統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的基本知識。

調查問卷的內容如果不是經過深思熟慮，其結果可能浪費了許多時間，卻不能深中要害，得到研究所需的資料。顧百里(Cornelius Kubler)《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78)的問題就出在調查事前沒有做過方言比較的工作，因此雖然設計了 50 個條項，其中大部分沒有什麼重要的方言差意義。結果只能繪出 12 張方言地圖。相對的，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的調查詞表雖然只有 27 條，但是每一條都具有方言差的重要意義，並且都繪製了詳細的方言地圖。顯然鍾露昇在進行地理方言調查之前做過比較方言學的功課。

周法高：桃園的閩南語、客語；楊時逢：桃園、美濃的客家話，這些文獻語料內容非常參差，結果只有董同龢在《四個閩南方言》的書末做了簡單的閩南方言音讀的比較，並沒有畫出方言地圖。

這個經驗對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更加寶貴，因為社會方言學所要調查的人數很多，問卷一定要力求精簡，以便在最短時間，收集到最關鍵性的資料，所以調查詞項一定要經過精挑細選。

2.1 方言比較與通變系統

2.1.1 一致性和差異性

方言比較的目的是要解明一個語言或方言的內部一致性和差異性。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1991)在討論福建閩方言時，不止比較了 18 個方言點的差異性，同時也比較了它們的一致性，文中所謂的一致性指的不是「語言普遍性」或漢語的一致性，而是專指閩語內部方言之間的一致性。作者說：

「我們認為[閩語]分為五個次方言區比較合乎實際情況，即：閩東話(以福州為代表)、莆仙話(以莆田話為代表)、閩南話(以廈門話為代表)、閩中話(以永安話為代表)、閩北話(以建甌話為代表)。而對其他方言來說，閩方言內部又確實存在著明顯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正是閩方言的基本特點，亦是閩方言有別於其他方言如北方方言、吳方言、粵方言、客贛方言的主要標誌。」
(p.1)

就是說，「一致性」指的是和其他漢語支不同而閩語內部一致的特徵，而所謂「差異性」指的是閩語內部所謂「次方言」(其實應該說是「語言」)⁷之間不同的特徵。

所謂「一致性」和「差異性」是相對的概念，方言特徵的分佈範圍才是絕對的概念。假定有一個方言特徵 $\langle x \rangle$ ，比如 $x =$ 古舌上音念舌頭音，它是閩語有別於其他語支的特徵，分佈範圍限定在閩語的分佈領域，所以對其他漢語方言來說具有「差異性」，但所有的閩語方言都有這個特徵，則 x 對閩語這個領域而言具有「一致性」；假定 $x =$ 鼻音聲母去鼻化為濁塞音(如 $m \rightarrow b$, $n \rightarrow l$, $\eta \rightarrow g$)，它的分佈範圍限定在閩南語區，所有的閩南語都有這個特徵，那麼 x 對閩南語這個領域而言具有「一致性」；但對其他的閩語言並沒有這個特徵，因此 x 就變成分別「閩南語」和「非閩南語」的特徵，也就是「閩語」內部的「差異性」了。

3.1.2 通變系統的建立

方言比較的目的在了方言變體之間的對應關係，根據對應關係，可以歸納出

⁷ 中國方言學家所謂的「方言」通常指的領域都很大，譬如所謂「閩方言」其實是漢語族(Chinese family)之下的閩語支(branch)，而該文所謂的「次方言」恐怕應該是「語言」(language)，這些語言的內部「方言」(dialects)很複雜，如閩南語泉州、漳州、潮州、海南島等方言的差異性相當大，兩個極端的方言根本無法通話；這些「方言」內部又有「次方言」(sub-dialects)。中國方言學家對於語言和方言的層次劃分不太能夠反映漢語語言或方言分化的事實。

所謂「通變系統」(diasystem)。Weinreich (1954) 根據英語的方言對應關係提出一個掌握方言對應的模式。他舉的都是 Yiddish 的例子，為便於了解，我們將之替換為閩南語的例子。

我們以閩南語央高元音韻類為例，這個變項可以歸納成四個字類：

- a. 〈基居〉類：漳泉方言都唸 i。如基、義、而、備……。
- b. 〈珠龜〉類：漳泉方言都唸 u。如臼、舊、主、住、殊、有、霧……。
- c. 〈居居〉類：龍溪漳音 i，泉州 i，惠安 i，廈門 u。如去、魚、豬、佇……。
- d. 〈居龜〉類：龍溪漳音 u，泉州 i，惠安 i，廈門 u。如自、思、史、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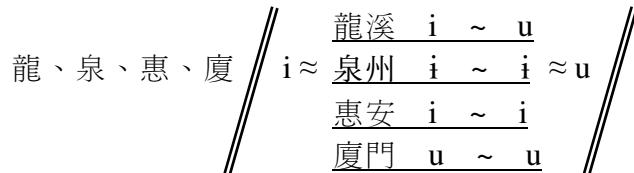
方言的對應關係列如下表：

(1)

	基居	居居	居龜	珠龜
龍溪	i	i	u	u
泉州	i	i	i	u
惠安	i	i	i	u
廈門	i	u	u	u

如表所示四個字類中，有兩個字類在四個方言中具有「一致性」，兩個字類有「差異性」。Weinreich 把這種部分相同、部分差異的對應關係寫成如下的圖式(scheme)：

(2)



他把這個圖式叫做「通變系統」(diasystem)，其實就是一種共時的方言比較、方言對應關係的模式。這種字類分析方法在歷史語言學上並不新鮮，但在結構主義的理論架構裡，每一個方言的結構都是獨立的，無法比較的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35)。Weinreich 的貢獻是把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應用到共時的方言研究來，並且加以模式化，使得所謂「通變系統」變得非常易解而實用。

其實，中國的音韻學家對於「通變系統」的研究早在隋代陸法言著作《切韻》(601)的時候就已經做得很成熟了。當時的漢語已經有好幾種韻書，紀錄了不同方言的漢字音。隋開皇初有劉臻等八個人在一起討論漢字音讀問題，覺得諸家分韻這麼分歧，需要一本可以包容南北方言分韻的抽象韻書，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於是決定打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据選精切，除削疏緩」的大原則，意思是說：如甲地有合韻的現象，而乙地卻分韻時，必須分為兩個韻，也就是「從分不從合」的原則。他把所有古今、南北

方言能夠分韻的都儘量分開，終於編成《切韻》這本韻書。換句話說，《切韻》不但是把共時方言抽象化，並且把歷時變化壓縮到一個共時的平面，是一個非常抽象的音韻系統。切韻音系就是隋代的「通變系統」。

但《切韻》編就以來，經歷了一千多年，現代漢語方言分化再分化，諸多現象無法涵蓋，《切韻》已經不適合做現代方言的「通變系統」了，因此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1999-2002)方言調查計畫所採用的問卷便放棄了以「切韻音系」為座標的調查詞表，純粹根據閩南語的文獻、方言調查，以及我們的領航調查資料，經過上述共時方言學的比較所歸納的「通變系統」而設計的。⁸

2.1.2 文獻研究與方言比較

「通變系統」的歸納需要兩件工作的配合，即：文獻檢索與領航調查。沒有經過這兩項工作的檢驗，所謂「通變系統」可能不夠完全，根據這個系統設計的調查詞表一定會掛一漏萬，輕重失衡，不會是好的詞表。

首先談文獻檢索。我們所參考的文獻包括四類資料：1)民間學者所著的傳統閩南語韻書，如泉州韻書《彙音妙悟》和漳州韻書《雅俗通十五音》及一些台灣出版的韻書；2)基督教傳教士所著的辭書，如：如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973)及巴克禮的《補編》(1923)；3)日據時代用假名符號標注的台灣話辭典，如小川尚義主編的《臺日大辭典》(1931-32)；4)現代漢語方言學家所做的閩南語方言調查報告。

自黃謙編成《彙音妙悟》(1800)以來，泉州、漳州、潮州、台灣的各種方言資料已經累積到非常豐富的地步，把這些資料拿來比對一下，閩南語的「通變系統」很容易可以整理出來，除了少數例外，哪些範疇具有方言差異性，哪些範疇具有一致性，一目瞭然。

198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進行「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的時候，本人便同時開始大量收集閩南語的方言文獻，利用自己的藏書，加上傅斯年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豐富的閩南語文獻，進行了閩南語方言細密的比較研究。其研究成果即後來發表的《『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洪惟仁 1996)、《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洪惟仁 1996) 以及多篇有關閩南語文獻及歷史音韻學的研究論文，而副產品則是編成了共十冊、各附解題的《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993)。這些文獻研究，有共時的比較方言學、也有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都是有計劃的在做方言比較的研究工作。

⁸ 放棄《切韻》做為參考座標對於不了解閩南語方言通變系統的傳統漢語方言學者的確會造成困擾，但這是正確的做法，方言是有層次性的，我們該檢討從現代方言直接跳到中古音做方言比較是現代方言學的問題。漳泉方言比較不能跳過閩南語直接跟閩語通變系統，也不能跳過閩語和中古通變系統(即切韻系統)比較。

2.1.3 領航調查

不過前述的文獻不一定是爲了純學術的興趣所作，大部份是爲了實用的目的。就是現代方言學家所做的方言調查報告也不能完全依賴，因爲學者的觀察力也可能有所見、有所蔽，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前輩學者不一定能夠觀察到而留下記錄。所以純粹依靠文獻的研究等於是受制於前人的眼界，無法超出前人的成就。

譬如前人的注意力主要著重在音段層次，對超音段層次的語音現象較少著墨，輕聲(neutral tone)與輕讀(unstressed)互相混淆(詳參洪惟仁 1998 的討論)，描寫輕聲的時候也不記調型，但在台灣閩南語，輕聲是有調型區別的，這些前人幾乎沒有討論到。1985 年我發表《閩南語聲調研究》(洪惟仁 1985)時對這些區別特別討論到，但有關其他的方言類型也所知有限，後來方言調查與語音實驗做得越多，對於台灣閩南語的聲調類型的了解才越深入。這些例子證明，語言研究不能完全依賴文獻，一定要用調查、實驗的科學方法和敏銳的觀察力去捕捉實際的語言現象，並加以規律化、概括化。

正式的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調查之前所進行的領航調查，就是確認方言變體類型與概略勾劃方言變體分佈的工作，這個工作做得越周到，越能保證調查詞表的完美；做得越不夠，調查詞表的缺點越多，對於日後實際的調查成果影響越大。

爲了閩南語的方言地理類型學的興趣，自 1985 年 2 月起，本人就設計了約一百個詞的調查詞表，走遍全台灣的閩南語區，做台灣閩南語方言的地毯式調查，搜集了約 200 個方言點的材料，特別注意聲調的方言現象。1988 年「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開始進行時，這個初期調查就變成了一種領航調查(pilot survey)。有了這個調查背景，後來再進行社會方言調查詞表的設計時就有了確實的根據了，我們根據詞表進行的調查就不會發生掛一漏萬的遺憾了。

2.1.4 字類與涵字

閩南語的「通變系統」包含的「變項」(variables)是根據我們的需要而設定的，「變項」有層次性(hierarchycal)，一個音韻變項(如韻類)可以包涵著一個、一些，一類或數類具有相同特徵的「詞」(word)或「語素」(morpheme)。

音韻變項所涵蓋的範疇用漢語語言學的術語，按聲母分的叫「聲類」、按韻母分的叫「韻類」、按聲調分的叫「調類」，而每一個變項之下又可以再分爲幾個範疇，謂之「字類」。

一個「字類」的「涵字」(或稱「轄字」)多寡不一，有些字類涵幾十個字，但有些字類只涵一、兩個字。製作調查詞表的時候，爲了節省調查時間，通常在每一個字類中選擇少數幾個字，而不是把所有的字都列入調查表中。

一個語言的方言「通變系統」到底有幾個「韻類」或「字類」呢？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以韻類來說，如果要根據「從分不從合」的原則來分的話，漳泉兩個方言比較所得的「通變系統」的「韻類」不止一百類，如果要把潮州、瓊

州都涵蓋進來，字類會更多。即使只限於漳、泉這兩種方言，因為調查資料到現在都還不太齊全，方言變體不斷地發現，有些是不太規則的對應，所以理論上字類的數量永遠也不可能決定。

2.1.5 調查字類的分級

字類這麼多，如果我們要把所有的字類都看成一樣重要，我們將會有「貓咬刺蝟，不知如何下手」之嘆，如果要等所有的字類都歸納完成再著手調查，這樣永遠沒有開始的時候。因此我們對於所要研究的字類不能不有所選擇，把字類分出一個「重要性」來。我們對所謂「重要性」的判斷立下 3 個原則做為「分級」的標準：

- 1) 涵字多的字類比涵字少的重要。
- 2) 涵字常用的字類及比不常用的重要。
- 3) 規則的對應比不規則對應重要。

總之，我們要先對「重要的」字類的常用字詞進行調查、研究，以後有機會才來進行「次要」的字類之調查、研究，這樣研究才有一個進度。至於到底我們所認定的「重要性」是怎麼決定的，因為資料需要調查才能夠齊全，所以在調查之先通常沒有辦法進行統計而加以數據化，到目前我們只能根據文獻檢索與方言調查所得資料判斷，而不是根據嚴密而完整的調查資料決定的。這一點大概也是一般方言學家所能做的程度，方言學的目的就是要用方言調查的方法了解通變系統，當然不可能先決定好通變系統並證明了各字類的重要性數據再來做方言調查。這個兩難說明了方言學研究是依循著辯證的法則曲折的前進，一面做調查，一面改進方法論。

2.1.6 字類命名

西方方言學中對於變項的命名通常只是用一對圓括弧括起來表示，如(x)表示 x 變項。在傳統的漢語方言學是用切韻音系的聲目或韻鏡之類韻圖所示的韻類名稱來為表示，如〈喻三〉、〈喻四〉、〈梗開三〉、〈山攝二三等〉之類。我們既然不用切韻音系做為座標，便不能沿用這個辦法。

筆者在〈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地理、社會階層的相關性〉一文（洪惟仁 2002）中，採用以泉州韻書《彙音妙悟》和漳州韻書《雅俗通十五音》的「字母」⁹ 做為複合韻目，替每一個字類命名的辦法。

⁹ 傳統閩南語所謂「字母」指的是韻母，而中國聲韻學所謂的「字母」（如守溫三十六字母）指的是聲母，英文所謂「字母」指的是拼音符號。但傳統閩南語文獻所謂的「字母」包含不同聲調的舒聲和韻尾發音部位相同的入聲的韻母，如 ing 和 ik 在現代方言學中通常處理成不同的「韻母」，但在《十五音》之類的韻書卻處理成相同的「字母」，所以一個「字母」通常有七個或八個不同聲調的「韻母」，看這個方言有幾個聲調，如泉州音有 8 個調，《彙音妙悟》的一個「字母」就包含 8 個「韻母」；漳州音有 7 個調，《十五音》的一個「字母」就包含

以泉州方言的央元音單音韻母來說，如表(2)所示，在《彙音妙悟》這本韻書，唸 $\text{\textcircled{e}}$ 的歸〈科〉字母，唸 $\text{\textcircled{i}}$ 的歸〈居〉字母。根據方言比較，這兩個字母的字在漳州《十五音》分屬兩個字母：〈伽〉e、〈檜〉ue 及〈龜¹⁰〉u、〈居〉i 等字母，仿照《切韻》「從分不從合」的做法，我們可以得到四個「韻類」。列表如下：

(3)

	彙音妙悟	泉音	十五音	漳音	例字
1	科	$\text{\textcircled{e}}$	伽	e	踅、塊、短、雪、退
2	科	$\text{\textcircled{e}}$	檜	ue	皮、卜、月、襪、裸、過、接、回、過、配、尾、飛、歲、課、吹、和、被
3	居	$\text{\textcircled{i}}$	龜	u	自、思
4	居	$\text{\textcircled{i}}$	居	i	汝、去、魚、薯、鼠、豬、鋤、語、據、處、煮

字類命名的方式是把第 1 類叫做〈科伽〉類(用角括弧括起來)，意思是這個字類在泉州的《彙音妙悟》歸〈科〉字母，在漳州的《雅俗通十五音》歸〈伽〉字母；以此類推，第 2 類叫做〈科檜〉類、第 3 類叫做〈居龜〉類、第 4 類叫做〈居居〉類等。這種方法在我們的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上證明是有效而方便的。

但是能夠採用這個方法來為字類命名的都屬於重要常用實詞。比較次要的或邊際的變項，譬如輕聲，就不適合這樣的類名，這時我們可以用角括弧把一個「變項」括起來，如〈x〉變項，x 可以代入〈Ts〉表示「傳調」(tone spreading)變項、〈xa〉表示「仔前變調：低調中調化」、〈xxx〉表示「三疊音降調類首字之調型」……。

2.2 問卷的形式與內容

2.2.1 傳統問卷形式

方言調查的問卷形式很多。大概每一個研究者都可以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設計自己的方言調查詞表。高本漢為了調查漢語方言所設計的調查詞表是最早的一種(參見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36)第四卷〈方音字彙〉)，以單字音為調查項目，中央研究院 1928 年起所做的方言調查字表也以單字音調查為主，如《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所用的單字音調查表是〈國父遺囑〉。以後出現的普林斯頓大學編的《方言調查字表》(1970)、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的《方言調查字表》(1955, 1981)都是單字音調查字表。

7 個「韻母」。

¹⁰ 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的 u 韵目用一個非常罕用的[舟居]合形的字，因為電腦上無字，為方便計改用同音的「龜」字代之。本文所有〈龜〉字母的「龜」字，其本字都是[舟居]合形的字。

隨著時代的前進，詞彙調查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因而有調查詞表的出現。中央研究院 1928 年所做的方言調查開始採用簡單的詞彙調查表，如《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所附〈極常用語彙表〉。比較完整的詞表是普林斯頓大學《方言詞彙調查手冊》(1972)，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的所有漢語方言調查均以此為本。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言詞匯》(1995) 所收詞目 1230 個。

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因為調查範圍很廣、人數很多，為了爭取時間，調查條項不能太多，並且每一個條項都要能夠反映方言差異。

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所調查詞彙只有 27 個；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78) 也只調查了 50 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1988-1996)調查詳表詞彙約 1000 個，簡表約 600 個，可以說是一個超大型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計畫。

社會方言調查的問卷內容遠比地理方言學的詞表精簡，因為我們在同一個方言點調查人數的人數很多(24-48 人)，為了有效地完成任務，每一個人分配的調查時間就不能太長，我們只能選擇該方言的幾個重要特色進行調查，調查詞項不能太多。以下就以這個社會方言調查所用的調查詞表為例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2.2.2 調查詞表設計原則

一般社會方言學調查詞表的設計原則有兩個：

1) 字類的選擇——雖然各個方言點的社會方言調查所用的調查詞表內容差不多，但因為每一個調查點的方言特色不一樣，因此問卷的內容詳略不完全一樣，比如汐止方言是一個最具特色的方言，因為值得調查的變項很多，所以調查問卷最長，每一個發音人的訪查大約 30 分鐘可以做完；漳州腔方言的特色比較少，問卷調查就比較短，大約 15 分鐘，甚至 10 分鐘內就可以做完。所以雖然每一個方言點的社會方言調查所用詞表大同小異，但詳略有不同。

我們在正式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之前還要再到預定調查的方言點進行一次「領航調查」，方法是用我們設計的社會方言調查詳表針對兩位老人和兩位青少年進行試驗性調查，比較老年層和青少年層的語言差異，然後針對這個方言的特色和變化中的語言成分設計個別的調查表。

完整的調查詞表，所列調查條項雖然多達 78 條之多，實際上每一個方言各有刪除，一個方言點大約只問 40 句到 60 句之間，包涵著 200 個到 350 個字音。

2) 問句的形式——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條項採用的是成句的問句。我們所以做這樣的改良，是因為我們覺得零星的詞容易變成翻譯問答式的提問，受訪者容易受到訪查員的口音或提問法所干擾，所得的回答傾向於字面的翻譯而不是實際的「使用語」，並且所花費的時間也比較多。所以改良的問卷把所有具有詞素意義的「字」都被包藏在「詞」中，所有的「詞」都編入一個完整的句子中，儘量讓受訪者了解句子的意思，用自己的話回答，而不拘泥於文字。

譬如我們請受訪者把「手巾包樹根」這個句子翻譯成他的閩南語，受訪者並

不知道我們問這個句子的目的是甚麼，但訪查員知道，我們就是要調查這個方言關於「手巾」的「巾」和「樹根」的「根」這兩個字怎麼唸。(關於問卷形式參見本文【附錄】)

2.3 方言類型與方言變體的編碼

2.3.1 方言類型分析

台灣閩南語的方言差主要是承襲閩南原鄉：漳州方言、泉州方言的差異，少數是自己特殊的發展，這些差異的來源，比較現代閩南語和傳統韻書，可以很容易的加以辨別。

研究台灣閩南語方音演變，首先要考慮漳泉方言本身自然演變的方向。泉、漳、台灣都各有新、舊音的競爭。泉州方言以山區的安溪腔最保守，然後由泉州市、三邑腔的惠安、晉江方言或同安方言，越接近海邊或漳州方言區變化越大，變化最大的是廈門方言。所有的次方言都逐漸喪失了古泉州音的特色(如央元音的崩潰)，新發展的音，本文謂之「新泉州音」。

同樣的漳腔方言也有一些新的變體(如中元音元音韻尾的消失)，謂之「新漳州音」，南漳州比北漳州保守，越接近泉州區漳腔特色越淡，漳州最東邊的長泰方言反而有一些泉腔特色。這是次方言變異以自然演變為主因，但漳泉相鄰的地區，難免方言接觸變化。

閩南語唐山過台灣之後，一部分是漳泉方言競爭產生的融合，也有一小部分是台灣閩南語新興的演變。方言演變有自己獨特的方向，但方言接觸是主要的觸媒。

我們要了解方言演變的來龍去脈，首先要搜集到足夠的變體，進行類型學分析，然後追溯類型分合演變的歷史軌跡。因此共時的地理方言學、社會方言學仍然要以方言類型學、歷史方言學為基礎。

2.3.2 方言變體的編碼

我們在對變體進行編碼(coding)的時候就是根據上述的原則，儘量就變體的來源、歷史的意義給一個碼，這雖然不一定必要，但因為變體編碼有了意義，比較好記，在記音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出錯。因此我們歸納出方言變體類型，分清是老泉州音、新泉州音，老漳州音、新漳州音，或台灣地區自己發展的新形式，然後給各種變體一個編碼(code)。下表是我們社會方言學研究的一些編碼，所列編碼只是舉例性質，實際上比較複雜：

(4)

J:漳州腔	C:泉州腔	O:舊形式
C ₂ :泉州腔另一種變體	Ch:泉州惠安、晉江腔	S:新形式

Jp:漳州漳浦腔	Ct:泉州同安腔	N:台南腔
J ₂ :漳州腔另一種變體	Ca:泉州安溪腔	P:澎湖腔
Jl:漳州南靖腔	Cl:泉州南安腔	Ji:永靖漳州腔
Jg:宜蘭漳州腔		

上述編碼屬於「類型學的分類」(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變體類型相同通常是因為有血緣上的關係，但有時只是不同的語言或方言平行演變的發展，或甚至只是偶然移借的結果。單一變體相同，不能簡單地就證明為有直系的血緣關係。判斷一個方言變體類型是否反映了在譜系上的關係，必須要用更多的參數互相比較才能決定。

詞表上對一個變體的編碼(code)可以說是任意的，標示的目的只為分別不同的變體類型，方便資料管理而已。編碼不完全具有地理方言學的意義，也不等於譜系學的意義。事實上一個變體類型可以分佈在漳腔方言，同時也分佈在不相鄰接的泉腔方言。譬如表(1)所示〈居居〉類(略當中古遇開三的韻類)，雖然漳腔方言大部分唸-i，但是漳州長泰、海澄有許多地方唸-u；泉州市唸老泉音-i，但晉江、惠安方言唸-i，至於同安方言有的唸老泉音-i，接近海澄的集美、廈門則唸-u。可見方言分佈有參差的情形，不能用漳、泉二分法來分類。¹¹

3. 結論

本文討論問卷設計是否需要的問題。漢語方言自高本漢(1915-26)以來的方言調查都有詞表的，董同龢(1948)修正了傳統方言調查方法，不用調查詞表，這在傳統方言學調查上是正確的，可以糾正中國漢語方言調查偏重字音調查而忽略語言實際的缺點。但直接運用到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來，這種方法的缺點可能受到調查人力、金錢、時間等客觀條件的限制，也可能產生語言完整性和語料一致性問題。調查表的要與不要，不是絕對的，要看研究目的與實際需要以及客觀條件的限制。

本文第二節討論問卷設計的理論與技術性問題。本文除檢討漢語方言調查上詞表設計的歷史經驗外，並以「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1999-2002)調查計畫為例，介紹了通變系統的歸納法，文獻檢索、領航調查，字類歸類及變體編碼等問卷設計的技術。

¹¹ 附錄的〈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是原問卷的部分摘要，注意問卷上寫明了各種可能的變體和它的編碼，都只是為了調查上和資料管理上的方便權宜標示而已。

引用書目

- Barclay, Thomas (巴克禮). 1923.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Amoy.* (漢英大辭典補編)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 Barclay, Thomas (巴克禮). 1923.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Amoy.* (漢英大辭典補編)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 Chambers and P. Trudgill. 1998. *Dialectology.* 2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Glasgow。俗名《廈英大辭典》，台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Karlgren, B. (高本漢). 1915-1926.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yde, Stockholm, and Goteborg. 1930. 北京影印，漢題《中華語音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1936. 改題《中國音韻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
- Newman, P. and M. Ratliff. (ed.) 2001.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 《方言調查字表》，Princeton University Chi-Lin Project.
-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2. 《方言詞彙調查手冊》，Princeton University Chi-Lin Project.
- Weinreich, Uriel. 1954. Is a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possible? *Word* 10:388-400. Reprinted in J. Fishman. (ed.) 1968.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lton.
- 丁邦新. 1980a. 〈澎湖語彙〉，《中國書目季刊》14.2:167-243。
- 編. 1981. 《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食貨出版社。
- 小川尚義主編. 1931-32. 《臺日大辭典》。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 中國社會科學院. 1981. 《方言調查字表》(新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匯》(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匯》(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洪惟仁. 1985. 《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台北・自立晚報。
- . 1993.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台北・武陵出版社。
- . 1996a.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 1996b. 《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 1998. 〈台灣話虛實語素在不同詞彙結構位置中的音長〉，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九九七全國英美文學、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論文集》頁 153-162。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梅祖麟. 2000. 〈中國語言學的傳統與創新〉，《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a.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黃謙. 1800. 《彙音妙悟》，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光緒乙巳（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九（1970）年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楊時逢. 1957.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22 本。台北・中央研究院。
- . 1971. 〈臺灣美濃客家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2.3:405-465。台北・中央研究院。
- . 1974.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上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董同龢. 1948. 〈華陽涼水井客家記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 本，收入丁邦新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1981)頁 153-273。
- . 1959. 《四個閩南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0 本。台北・中央研究院。
- 謝秀嵐. 1818.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油印本。台北・國科會報告。
- 顧百里(Cornelius Kubler). 1978. 《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附錄】〈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調查問卷〉(節要)

聲調部分

01 汝姓趙對不對

汝姓趙著毋著

- 1 汝 J: li C: lir Ct:lu
- 2 姓 J: s̄e C: s̄i
- 趙 J: tio 22 C: tio 21 S: tioq 22
S: tior
- 3 趙 t : M:22 H:33 R:23
LF:21 L:11
- 4 趙 q : q[?] *q(無喉塞音)
- 著 J: tioh22 C: tioh23 Ct: tioh3
Js: tio 22 Cs: tio 23 Ct: tio33
Js: tior Cs: tior Cts: tior
- 5 著 t : M:22 H:3 HR23 HF31
LR12
- 6 著 q : q[?] *q(無喉塞音)

05 陽平變調：茶米=袋米；鋤頭=

豬頭

調型：J:[22≠11];[22=22](5=1)
C:[11=11];[22≠11](5=7)
S:[22=22];[22=22](1=5=7)

聲母部分

16 寫字，寫了二十二字

寫字，寫二十 二 字

- 1 字 J: ji C: li Jg:gi
- 2 二 J: ji C: li Jg:gi

17 热天日頭真大

- 1 热 J: jua C: lua
- 2 曰 J: jit C: lit Jg: git

20 我的小孩不會說英語

阮囷袂曉講英語

- 1 阮 J: guan C: gun
Js: uan Cs: un
- 2 國 J: kiann² C: kann²
- 3 袂 J: be C: bue
- 4 曉 J: hiau S: hiang
- 5 語 v J: gi C: gir Ct: gu
- 6 語 c O: g- S: o-

元音部分

21 糕仔好食、糊仔毋好食

糕餅好吃、漿糊不好吃

- 1 糕 O: ko S: kɔ N: kor
- 2 糊 O: kɔ S: ko N: kor
- 3 類型：O: 分 S: 合 N: 台南型晨昏

22 海裡出蚵仔，山裡出芋仔

- 1 蚵 O: o S: ɔ N: or
- 2 芋 O: ɔ S: o
- 3 類型：O: 分 S: 合 N: 台南型晨昏
參考：二哥~二姑

韻母部分

23 一雙襪子一隻鞋

一雙襪仔一奇鞋

- 1 雙 J: siang C: sang
- 2 襪 J: bue C: ber Ct: be
- 3 奇 J: khia C: kha S: ciah
S2:ki
- 4 鞋 J: e C: ere Ct: ue

24 我妹妹逛街要買針

阮小妹踅街卜買針

- 1 阮 J: guan C: gun

Js: uan Cs: un
2 妹 J: muē C: ber Ct: be
J₂: muāi Sm:sio me Jc:gue
H:mei H2:me me
3 雀 J: se C: ser
4 街 J: ke C: kere Ct: kue
5 買 J: be C: bue

摘要

漢語方言學的發展分成好幾個階段，從高本漢以下的大型漢語方言調查都採用以切韻音系為參考座標的調查字表或詞表。但 1948 年董同龢調查四川華陽涼水井客家時開始不用詞表，在台灣所做的方言調查也都不用調查詞表。本文認為不用詞表只是傳統方言學調查法中的一種，進一步做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沒有詞表的調查方法會發生三個問題，即：調查人力、時間的問題，語料完整性問題，語料一致性問題。

但方言詞表的設計不一定要根據切韻音系，詞表的設計需要根據研究方言的性質、類型與研究目的而定。本論文除檢討漢語方言調查上詞表設計的歷史經驗外，並介紹了通變系統的歸納法，領航調查，字音歸類及變體編碼等問卷設計的技術。

關鍵詞：方言調查詞表、方言比較、通變系統、方言類型分析

The necessit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Word-list for dialectal survey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alectal surveys can be divided into some stages. Since Karlgren (1915 – 1926), the word-lists in large-scale dialectal surveys have been all based o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Chie-yun. However, Tung (1948) broke the tradition in a Szu-chuan dialect survey in which he did not use any word-lis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problems of not using word-lists: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power and time constraint, the inconsistence of investigation items and the integrity of data.

A word-lis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er to the Chie-yun system. We can design any type of word-lists based on the property or typology of the dialects and the purpose of th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some 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y of word-list design, including dialectal comparison and inductive method of diasystem, pilot survey, categorization of words, typological analysis, and coding of variants.

Key words: word-list in dialectal survey, dialectal comparison, diasystem,
typological analysis